

北方地区汉墓格局演变与汉代边疆政策的关系*

蒋璐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浙江 杭州市 310058)

关键词: 北方地区; 汉代墓葬; 汉代边疆政策

摘要: 北方地区是汉代为了阻挡外族侵略而重兵把守的地区。本文在对这一广大地区汉代墓葬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 将墓葬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 结合文献中汉朝对北方边疆的经略, 对墓葬格局演变与汉代边疆政策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Key words: North China; Han Period tombs; Han Dynasty's policy for the borderland

Abstract: North China was a region for the Han Dynasty to guard with massive forces so as to resist foreign ethnic groups' aggression.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Han Period tombs discovered in this vast region, the present paper divides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se graves into three stages. Furthermore, with the literal records on the Han Dynasty's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political pacification in the northern borderland taken into account, the author makes a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 of the changes of these tombs' distribution region to the Han Dynasty's policy for the borderland.

DOI:10.16143/j.cnki.1001-9928.2015.03.009

北方地区处于中原汉王朝与北方匈奴活动区域的中间地带, 是两汉时期中原王朝抗击匈奴的主要战场。为了阻挡外族进攻, 汉王朝对这一地区实行屯垦戍边的政策, 造就了该地区繁盛一时的汉代文化。目前在汉代司隶校尉部以北的长城沿线, 包括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宁夏全境和甘肃的部分地区都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汉代墓葬。本文在对这一广大地区汉代墓葬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 将墓葬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 结合文献中汉朝对北方边疆的经略, 对墓葬格局演变与汉代边疆政策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一、北方地区汉墓的发展阶段

通过对北方地区汉墓材料的系统梳理,

参照中原地区汉墓已有的研究成果, 以及北方汉墓中出土的具有断代意义的铜镜、铜钱和部分墓葬中的纪年材料, 大致可以将北方地区汉墓划分为六期, 即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西汉末至东汉初期、东汉前期和东汉中后期^[1]。结合墓葬形制和陶器组合的发展特点和规律, 可以将北方地区的汉墓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 即西汉早期。墓葬数量较少, 主要见于河北北部、山西朔县和陕西甘泉、甘肃庆阳等地。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和地理位置的原因, 以上地区与周边地区的互相影响和联系的密切程度各有不同: 河北北部与北京地区联系密切, 山西朔县与关东地区有一定联系, 而陕西甘泉、甘肃庆阳与关中地区具有更多一致性^[2]。

* 本文得到 2015 年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 (人文社科类) 的资助, 编号为 Y201533274。

第二阶段,即西汉中期~东汉前期。经过汉初的经济发展和文化整合,汉文化到西汉中期形成了完整的形态^[3]。这一阶段是汉文化在北方地区的发展时期,也是新旧特征融合的阶段。

西汉中期以后,在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北方地区的墓葬逐渐发展起来。除在第一阶段已经出现汉墓的地区之外,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包头、巴彦淖尔、鄂尔多斯、宁夏及陕西北部等地区均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墓葬。其中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宁夏地区目前尚未发现西汉早期的墓葬,而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前期的墓葬在当地已发现的墓葬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这一阶段,北方地区汉墓的文化构成比较复杂,既受到了秦文化、楚文化、北方游牧文化的影响,也受到来自南方汉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对各地区的影响程度不等,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但并没有构成各地区文化的主体,它们在各地的出现是汉文化构成复杂性的一种体现。

第三阶段,东汉后期。这一阶段是汉文化在北方地区继续发展时期。砖室墓成为最主要的墓葬形制,生活用具、模型明器、祭奠用具为这一阶段的主要随葬品,其中模型明器的数量和种类与第二阶段相比有了较大的增加。

这一阶段的墓葬分布主要见于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内蒙古呼和浩特及包头地区、宁夏全境和陕北、晋西北地区。在文化面貌上地区间差异逐渐缩小。但由于在东汉后期,北方地区成为来降南匈奴的安置地,在内蒙古包头、绥德黄家塔等地的汉墓中发现了少数具有匈奴特点的陶器和骨器。同时,受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影响^[4],在陕北和晋西北地区东汉后期的画像石墓中出现了反映农牧生产和狩猎的图案。汉匈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成为这一阶段北方地区汉代文化的特色。

总之,从墓葬表现出的文化面貌来看,两汉时期北方地区经历了由地域差异明显到逐渐统一的过程。这是汉文化不断发展的结果,也与两汉时期不断完善和巩固的中央集权制度相适应,但不同区域汉墓格局的发展具有“渐进”和“突进”的不同特点:北方地区的两端,如河北北部、山西北部以及甘肃庆阳、陕西甘泉等地在三个阶段始终分布有墓葬,表现为延续的渐进式的发展,而位于北方的中段地区,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巴彦淖尔地区及宁夏等均是西汉中晚期以后新形成的墓葬分布区。这些墓葬分布区是在第二阶段突然形成的,并且在发展上表现出了急剧发展又陡然衰落的突进式发展过程。例如内蒙古巴彦淖尔,这一地区是西汉中晚期繁盛一时的汉墓分布区,但到了东汉后期,基本没有发现墓葬。

二、汉墓格局与汉代的边疆政策

出于抵挡日益强大的匈奴联盟的需要,自战国中晚期开始,秦、燕、赵三国开始在北方边境修筑长城。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对三国长城进行修复和连接,并沿北流黄河天堑和河套北面新建长城^[5]。但秦长城的防御作用也只维持了十多年,此后由于诸侯畔秦,“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6]。其中的“故塞”就是指秦昭王时期所筑的长城,此时该长城以北和以西的地域已经被匈奴所占据。

1. 西汉初期

西汉初年,汉朝仅能维持秦时边塞,所控制的亦即秦昭王长城、战国赵长城和燕长城以内的地区。今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部和河套地区^[7]等秦昭王长城以北地区,并没有在汉王朝的有效管辖范围之内。

目前在北方地区发现的西汉早期墓葬分布于今山西省北部、河北北部和甘肃庆阳等地,皆位于长城以内,而在长城以北地区少

见墓葬，这一现象与文献记载相符合。同时这些地区也是接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早的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位于北方地区东端的河北北部由于归入燕国版图，在文化面貌、生产方式上与中原逐渐接近，在战国中晚期时成为燕文化的分布区^[8]。位于北方地区西端的甘肃庆阳地区也受到了较多中原文化的影响。进入汉代以后，汉朝继续保持着对与中原交往已久地区的控制。从地理位置上考虑，甘肃庆阳地区靠近汉朝京城，是保卫长安免遭匈奴侵略的最后防线，也应当是汉朝重兵把守的地方。山西北部的朔县一带也分布有西汉早期墓葬，朔县是汉代雁门郡的军事要地马邑，汉初匈奴入侵雁门郡时，有两次直攻马邑，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对匈奴的第一次大规模反击战——马邑之围也发生在这里。由于占据着遥控长城、外连大漠的重要位置，这里自然也就成了汉朝需要首先控制和管辖的地区。

2. 西汉中晚期~东汉前期

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到西汉中期国力渐强。汉武帝时期，开始了对匈奴的一系列军事活动。对北方边疆拓展，同时在新获得的地区移民屯垦，巩固边防。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9]；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帅汉军击败匈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内附，汉朝又“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10]；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统领汉军出兵大败匈奴，“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甘肃永登县），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11]。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于“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12]。

武帝时期对新开辟地区采取设置郡县、移民屯垦、军事屯田等一系列的措施，北方边

地的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由于汉朝的移民和屯垦，人口开始大量涌入，北方地区西汉中晚期以后墓葬数量迅速增加，分布范围扩大。与西汉早期墓葬主要位于秦昭王长城之内相比，西汉中晚期的墓葬分布主要是向秦昭王长城以外的西北边疆推进。例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巴彦淖尔地区、宁夏银川周围地区等均位于秦昭王长城西北。其中的呼和浩特地区和巴彦淖尔地区的大致范围位于文献记载的“五原”和“朔方”两郡。这两个郡是汉武帝元朔二年，收取河南地后新置的，是这一时期汉朝疆域拓展的见证。

以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磴口县为例，这里共发现汉代墓葬132座，年代集中在汉朝大规模开发北方的西汉中期至西汉末期，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的种类与中原同时期汉墓基本一致。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陶仓发现数量众多，形制多样，并且出现了同一墓中随葬不同类型的若干个陶仓。部分陶仓在仓门两旁多模印有守卫粮仓的官吏。有些陶仓内还发现有粮食。鸮壶也是该地特有的一种器形，这种壶以保护粮食免遭鼠患的猫头鹰为原形，造型生动。这些器物及其装饰表明该地在汉代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也表明西汉朔方郡一带物阜民丰的局面。另外，墓葬的用材考究统一，夫妻合葬的比例很高都体现了北部边疆地区富足安定的社会局面。由于汉朝对北方地区的有效管辖，促成了该地区的稳定，这也正是这一时期的汉代墓葬大量存在的前提条件。

此外，北方地区规模较大的墓葬也多集中出现在西汉中晚期。这种墓一般地表有大型封土，墓室规模较大，随葬品中青铜器占很大比重。例如宁夏固原城西3号墓出土一些青铜容器，如壶、钫、盆等，还发现铜鐎和剑鞘扣饰件等兵器上的饰物。墓主人可能是西汉时期驻守当地的军事官员或官吏^[13]。汉代对北部边疆地区的开发以其军事目的为重，除民屯外也有军事屯田的性质^[14]。北

方地区较大型墓葬的出现与军屯的实行不无关系。

王莽时期由于实行错误的民族政策,北方地区曾一度为匈奴重新占领^[15],至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匈奴扶植卢芳建立割据政权,入居五原郡,都九原,“掠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并置守令,与胡通兵,侵苦北边”^[16]。此时北方边郡如定襄、朔方、五原多有省并^[17],匈奴“复寇上谷、中山,杀略钞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18]。

北方边疆的动荡局面直到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南匈奴归附才有所好转。《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汉助南单于建庭于五原郡西部塞八十里处,迁居云中,又入居西河郡美稷县”^[19]。南匈奴附汉后,汉朝派人恢复了当地的建制,保护南单于。“冬屯夏罢……及悉复缘边八郡”^[20]。“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21]。

匈奴在西汉时期和东汉早期分别内附,为北方地区的稳定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经历了东汉初年边境动荡,部分地区的建制,尤其是西汉时期的朔方郡,在东汉前期“缘边八郡”居民重归故土时也没有恢复。东汉前期北方地区墓葬发现数量较少,排除考古发现的偶然性,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边境内缩,郡县内迁的客观反映。

3. 东汉 中后期

东汉初年边境的动乱虽然得到了平复,但是这种安定局面只是暂时的。此后由于东汉政府国势日蹙,北方边郡受到匈奴和鲜卑的寇扰,动荡局势进一步恶化,北方地区中西部的沿边郡县或者内迁,或者省并。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南匈奴左部句龙吾斯、车纽等叛汉,东汉政府被迫将郡县内迁,“徙西河郡居离石,上郡居夏阳,朔方居五原”^[22]。西河郡治由平定(今准格尔旗)南迁至离石(今山西离石),朔方郡治

所由窳浑(今磴口保尔浩特古城)迁至五原(今包头麻池古城)。而武帝时期新设置的“朔方”“五原”等郡县,在东汉时期由于受到匈奴、羌、鲜卑等族的频繁侵扰,多进行了省并。西汉朔方郡下设十县,在东汉时裁并为五县,设置在今鄂尔多斯境内^[23]。到献帝建安年间,原来的“五原郡”和“朔方郡”均省并为一县^[24]。

与东汉时期的西北边疆郡县内徙、郡制遭到严重破坏相对应的是,东汉北方边郡人口的锐减。对比《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中记载的西汉和东汉时期北部边郡的户数、人口数:东汉时期朔方郡的户数、人口数均较西汉时期减少了94.2%;五原郡的户数减少了88.1%、人口数减少了90%;云中郡的户数减少了86%,人口数减少了84.7%^[25]。原属于朔方郡的今巴彦淖尔磴口县在西汉时期是墓葬分布极为密集的地区,但在东汉时期突然衰落,基本不见东汉初期以后的墓葬,应当与这样的人口锐减有直接关系。

总之,西汉初期,汉朝在对匈作战处于劣势地位时,尚未取得对北方地区的绝对控制,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被匈奴占据,因此汉墓仅在已控制地区有少量分布。西汉中期以后,武帝的文治武功,对匈战争节节胜利,出于对新占领地区巩固边防和统治的需要,对北方地区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开发,由此北方地区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内地居民的大量涌入,是汉墓数量剧增最主要的原因,出现了许多新的墓葬分布区,在发展上一度达到鼎盛。东汉 中后期,东汉政府深受内忧外患之困,放弃了对部分北方地区的控制,尤其对西汉中期以后新获得的西北边疆地区,由于控制不得力,众多郡县内迁,边境收缩,造成了部分地区汉墓发展的断裂。可以说,两汉时期的边疆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区变化在北方地区汉墓的格局演变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下转152页)

- 县博物馆. 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 文物, 1975, (7): 51~66.
- b. 周广明. 吴城遗址原始瓷分析. 见: 吴城: 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附录六.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525~529.
- [8] 安金槐. 谈谈郑州商代瓷器的几个问题. 见: 安金槐考古论文集.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9: 293~297.
- [9]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 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510.
- [10] 同[2].

(责任编辑: 张 凤)

(上接 87 页)

- [1] 蒋璐. 中国北方地区汉墓研究.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
- [2] 蒋璐. 北方地区西汉早期墓葬研究. 边疆考古研究(第十辑), 2011.
- [3] 俞伟超. 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 见: 古史的考古学探索.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2.
- [4] 《汉书·地理志》记载“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 修习战备, 高上气力, 以射猎为先。”(班固. 汉书·地理志·卷二八下.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644.)
- [5] 《史记·蒙恬列传》记载“始皇二十六年, ……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 收河南. 筑长城, 因地形, 用制险塞, 起临洮, 至辽东, 延袤万余里。”(司马迁. 史记·蒙恬列传·卷八八.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2565, 2566.)
- [6] 司马迁. 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一.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7] 一般认为, 河套平原以磴口县为界, 以西至石咀山为后套平原, 以东至呼和浩特为前套平原.
- [8] 杨建华.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137, 138.
- [9] 司马迁. 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〇.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2909. 文献中的“朔方”, 应该是朔方刺史部, 包括上郡、西河、北地、朔方、五原等郡, 而不仅限于朔方一郡.
- [10] 司马迁. 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〇.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2909. 《汉书·食货志》在解释“新秦”时说, 秦始皇派蒙恬北击匈奴, 略取河南之地, 并且“徙民充之, 名曰新秦”, (班固撰, 颜师古注. 汉书·食货志·卷二四下.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162.) 其地理位置在今鄂尔多斯和河套平原一带.
- [11] 司马迁. 史记·匈奴列传·卷一一〇.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2911.
- [12] 司马迁. 史记·平准书·卷三〇.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439.
- [13] 固原博物馆. 宁夏固原城西汉墓. 考古学报, 2004, (2).
- [14] 王大方. 汉武帝阴山之役和朔方、五原郡的屯垦开发.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7, (2).
- [15] 《汉书·王莽传》记载, “莽壮其言, 以威为将军. 然采普言, 征还诸将在边者. 免陈钦等十八人, 又罢四关填都尉诸屯兵. 会匈奴使还, 单于知侍子登前诛死, 发兵寇边, 莽复发军屯. 于是边民流入内郡, 为人奴婢, 乃禁吏民敢挟边民者弃市”。(班固. 汉书·王莽传·卷九九中.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4138.)
- [16] 范晔. 后汉书·卢芳传·卷一六.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506.
- [17] 范晔. 后汉书·光武帝纪·卷一.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57~73.
- [18] 范晔.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卷八九.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940.
- [19] 范晔.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卷八九.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945.
- [20] 范晔.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卷八九.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945.
- [21] 范晔. 后汉书·光武帝纪·卷一.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78.
- [22] 范晔. 后汉书·顺帝纪·卷六.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70.
- [23] 张郁. 汉朔方郡河外五城.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7, (2).
- [24] 陈寿.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卷一.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45.
- [25] 西汉时期的数据引自《汉书·地理志·卷二八下》(中华书局, 1962: 1616~1621), 东汉时期的数据引自《后汉书·郡国志》(中华书局, 1965: 3525~3526.)

(责任编辑: 辛 革)